

邓永昌/著

中国和平发展与 西方的战略选择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vs.
Strategical Selections of Western Countri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际政治论坛

中国和平发展与 西方的战略选择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vs.
Strategical Selections of Western Countries**

邓永昌/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前言

探索中国与世界共赢的 和平发展道路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一本讨论中国和平发展与西方战略互动的书。进入 21 世纪，国际上一些专家学者、政界要人、新闻媒体在热烈讨论一个话题——“中国崛起”。他们讨论中国崛起将会怎样影响全球，怎样改变世界，以及对西方和美国构成什么挑战。一些西方国家从“崛起”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甚至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制定对华政策。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发展牵动了世界，引起了各国的高度关注；同时也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中国发展与他国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所以各国对中国的发展要做出反应。问题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如何与中国进行战略互动，这是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双方的发展和安全，而且事关 21 世纪全球稳定和繁荣。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是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探寻一条双方良性互动的途径以实现共同发展，造福双方国家和世界。这是本书讨论中国和平发展与西方战略互动的一个原因。

本书讨论这一问题，还因为当今世界发展到一个紧要的关头。这个关头的紧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过去 1000 年的历史看，世纪之交前后时期往往是战乱高发期。例如 11 世纪快结束时，1096 年欧洲封建主和罗马天主教会发动了十字军东征的

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将近两百年；1209年13世纪开始不久，蒙古铁骑如飓风席卷欧亚大陆长达半个多世纪；此后在17世纪初的1618年，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在18世纪初的1701年，爆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8世纪末的1789年，法国爆发震撼欧洲的大革命；1792年爆发了拿破仑战争，打到19世纪初的1815年才结束；20世纪一开始，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1939年爆发了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末，情况依然如此。1991年苏联在动乱中解体，同年爆发了第一次海湾战争。1999年爆发了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战争。过去1000年的历史证明，世纪交替前后时期，往往成为战乱高发期。

这种情况到底是历史巧合，还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在世纪交替前后的战乱时期，一些国家兴起了，一些国家衰落了，一些国家瓦解了。例如20世纪上叶的战乱使德国、日本、英国衰落，却使美国和苏联兴起。20世纪末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动乱中分化，却使两德统一，德国重新复兴。可见，世纪交替前后时期的动乱导致一些国家的兴起或衰落。

从21世纪头几年看，世界似乎又进入了战乱高发阶段。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主义袭击。2002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美国再次发动伊拉克战争，使这个国家濒临分裂边缘。2006年，爆发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战争。美国解决伊朗核问题是否最终动用武力打响另一场战争，还是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21世纪头几年的战乱显示，全球又处在一个紧要关头。对中国来说，这个关头的紧要性表现在：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这个战略机遇期碰巧与世界战乱高发期重叠，中国如何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安全度过这个战乱高发期，并充分利用好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民族复兴，对中国的兴衰来说极为紧要。

二

说世界处于紧要关头，还有一个原因是 21 世纪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家群体走向崛起。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地缘环境、崛起的时代和国际条件，与 18 世纪英国和法国崛起，19 世纪美国、德国、日本崛起，20 世纪苏联崛起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大国以什么战略应对这些国家的崛起以及这些国家走什么样的崛起道路，关系 21 世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大国崛起，但由于当时人类智慧的局限，领先强国与崛起国家不能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利益争端，往往采取冲突的方式解决矛盾，结果引发多次大规模战争，酿成重大灾难，多次改变世界版图和一些国家民族的命运。

21 世纪，西方大国能不能放弃“崛起—遏制—战争”的传统战略，以新思维应对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崛起；而崛起国家能不能跳出“崛起—扩张—冲突”的西方大国崛起模式，走出一条新的崛起的道路；双方能不能超越历史、文化、民族、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限制，智慧地正确处理双方的利益矛盾，避免发生大的冲突、重蹈历史覆辙，这决定着 21 世纪人类命运和世界的前途。

庆幸的是，在这紧要关头，中国庄严宣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和平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给 21 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带来了希望。在大国崛起历史上，崛起国家向全世界郑重宣告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可能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最好礼物。中国探索以和平发展方式实现复兴，也为解决领先大国与崛起国家矛盾冲突的历史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三

探索和平发展道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

平发展理论，开辟出一条与世界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一天天走向崛起，初步跨进了世界强国的行列。

进入新世纪，继续探索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仍是中华民族要解答的重大历史性难题。《中国和平发展与西方的战略选择》一书，从历史与现实、文明与民族、时代与地缘、政治与经济的视角，审视中国复兴与西方大国崛起的不同路径；剖析中西文明对大国崛起的不同认知；比较中国崛起与西方国家崛起的不同模式；对照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对崛起道路的不同选择；讨论中国与西方大国的战略互动，认为中国和平发展理论和模式，突破了西方大国的“崛起—遏制—冲突”的旧模式，既是大国崛起实践和理论的创新，也是对国家发展理论的创新。书中着力分析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明基础、民族条件、理论经纬、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外交方略、安全保障、时代条件和地缘环境，揭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复兴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书中对大国崛起的历史现象、西方大国崛起走武力扩张道路的共同原因以及中国崛起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殊原因进行考察，得出一个重要观点：一国崛起选择什么道路，是由该国的文明和民族、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自然地理、时代条件和地缘环境、社会状况和外交方略等综合因素决定的。不是崛起事件本身决定国家的崛起道路，而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综合因素决定国家对崛起的选择。中国崛起的综合因素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必然选择不同于西方大国的崛起道路——和平发展道路。这一观点，为人们认识大国崛起这一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世界认识中国崛起提供了新思路。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甚了然，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崛起产生了疑惧。在国内，不少人对自己国家走的和平发展道路认识也比较模糊。书中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平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从丰富的理论和政策中提炼出一个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模式。这一研究成果，对于世界上的人们认识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大势以及中国人认清国家走的发展道路将会有裨益。书中对中国走一条什么样的和平发展道路、怎样走这条道路、中国能否最终走到崛起成功终点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成败将对

世界产生什么重大影响等问题，进行大量分析论证，探讨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现实矛盾与潜在矛盾、国内矛盾与国际矛盾，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讨论西方大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以及中国与西方大国的战略互动，是全书主旨之一。书中分析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对华战略的利弊得失，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导致西方与中国利益依存日益增大，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核扩散、跨国犯罪和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威胁世界，各国必须共同应对共同挑战才能维护自身安全与繁荣的环境下，西方、尤其是美国应突破传统的大国崛起理念，超越霸权，放弃结盟对抗型外交，选择合作型对华战略才是明智之举。因为在相互依存、相互合作才能维护彼此安全与繁荣的 21 世纪，对抗没有赢家，大国冲突只能导致双方衰落。

书中还探讨了西方大国与中国进行良性互动，避免冲突，实现双赢的可能性及方略，强调如果美中掉进非理性互动的陷阱引发冲突，将给世界带来难以承受的巨大灾难性后果。所以 21 世纪能否实现持久繁荣与和平，不仅取决于中国走什么样的崛起道路，而且也取决于西方能否理智地与中国良性互动，能否利用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共创全球繁荣。讨论中国和平发展与西方的战略互动，书中所得结论认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复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西方与中国合作共赢的前景是存在的。因此争取双赢、造福世界，是全球化时代西方大国与中国实现互利共赢的最佳选择。这一观点突破了西方的“崛起—遏制—冲突”的理论樊篱，与西方研究大国战略互动的同类书相异趣，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理论增添了亮色。

目 录

第一卷 中国和平发展之路

第一章 中国和平发展三部曲	3
一 西方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猜疑	3
二 中国和平发展三部曲	5
三 国际上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争论	20
第二章 文明决定国家崛起的方式	26
一 文明是决定国家选择崛起方式的基因	26
二 中华文明决定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崛起方式	30
第三章 民族品性引导国家的崛起行为	53
一 民族品性与国家的崛起行为	53
二 珍爱和平的民族品性引导中国的崛起行为	57
三 仁慈包容的民族品性引导中国的崛起行为	64
四 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性引导中国的崛起行为	72
第四章 和平发展理论与和平发展道路	78
一 和平发展理论产生的背景	78
二 中国和平发展理论和道路	85
三 国家核心利益要求中国长久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	93
第五章 中国和平发展的政治模式	101
一 政治模式主导国家发展路径	101

二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引导和平发展的航标	105
三	共产党执政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主心骨	111
第六章	构筑和平发展的社会平台	123
一	西方大国非和平崛起的社会平台与政治状态	123
二	构建和谐社会为和平发展铺设国内平台	127
三	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层矛盾及解决途径	135
第七章	铺设和平发展的经济通道	147
一	导致西方大国武力崛起的经济模式	147
二	日本与德国战后经济崛起的启示	151
三	中国和平发展遭遇经济模式障碍	154
四	中国和平发展的经济模式	159
第八章	地缘环境与时代条件	170
一	以新视角评估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环境	170
二	中俄地缘政治关系的现状与前瞻	172
三	中印地缘政治关系发展态势	176
四	中国与其他邻国的地缘政治关系	180
五	时代条件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	181
第九章	中国和平发展的安全防卫	193
一	经济风险与安全防卫	193
二	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政治风险	199
三	文化风险与安全防卫	205
四	军事风险与安全防卫	212
第十章	和平发展外交方略	218
一	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模式	218
二	和平发展型外交形成与发展轨迹	224
三	坚持奉行和平发展型外交共建和谐世界	232
四	第一卷结论	241

第二卷 西方的战略选择

第十一章 “中国威胁论”	247
一 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三种关注	247
二 中国崛起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	257
三 中国崛起的独特性令西方困惑	265
第十二章 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对华政策	269
一 两极世界格局瓦解后的美国全球战略	269
二 美国全球战略下的对华政策	281
三 美国对华政策不稳定的深层原因	288
第十三章 美国对华战略的明智选择	294
一 中美百年关系的启示	294
二 美国对华战略选择可行性评估	298
三 超越霸权:美国对华战略的明智选择	311
第十四章 中国与美国互动之策	318
一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及趋势	318
二 美国对华政策战略预期分析	321
三 中美关系呈现六种状态	323
四 中国与美国互动之策	326
第十五章 日本通往政治大国道路上的陷阱	344
一 21 世纪初的中日关系	344
二 日本的大国追求与面临的障碍	348
三 日本通往政治大国道路上的陷阱	354
第十六章 中国复兴与日本的大国追求	367
一 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困惑	367
二 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分歧	370

三	日本强硬派的认识误区	374
四	发展世代友好的中日关系	382
第十七章 中欧共同复兴的舞步		392
一	欧盟崛起与世界多极化进程	392
二	中国与欧盟共同崛起的战略呼应	404
三	建立支撑中欧共同崛起的战略架构	411
第十八章 中国和平发展成败与世界的前途		417
一	中国和平发展对世界的巨大经济贡献	417
二	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424
三	中国和平发展成功将为世界带来持久和平与繁荣	427
四	中国和平发展失败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433
五	第二卷结论	441
第三卷 塑造和平发展的中国		
第十九章 和平发展与祖国统一		447
一	新世纪中国和平统一进程与方略	447
二	剖析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几个重要问题	456
三	两岸关系发展前景分析与展望	466
第二十章 塑造和平发展的现代文明中国		473
一	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深层挑战	473
二	塑造和平发展的现代文明中国	485
三	第三卷结论	497
参考文献		499
后 记		505

第一卷

中国和平发展之路

第一章

中国和平发展三部曲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有时会对历史产生自觉而创造自觉的历史。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提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是对历史的自觉；西方资产阶级在启蒙思想家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民主革命，是创造自觉的历史。19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亦是人类对历史的自觉；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行革命，同样是创造自觉的历史。进入 21 世纪，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一个国家群体正在崛起，这一态势表明人类进入了一个创造历史的新阶段。站在这个历史阶段上，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告：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人类又一次对历史的自觉而创造自觉的历史。

一 西方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猜疑

在历史长河中，大国崛起比比皆是，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庄严宣告不搞武力扩张，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或许，正是由于过去（尤其是殖民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没有国家提出过这种和平发展理念，所以一些西方人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心存猜疑。他们怀疑中国宣称“和平发展”是迷惑西方的韬晦之计，因而对中国心存戒备，喋喋不休地散布五花八门的“中国威胁论”。也有不少西方人虽然相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愿望是真诚的，但他们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否行得通，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甚了然，对决定中国选择走这条道路的文明、民族、政治、经济、地缘、时代等综合因素也知之甚少，所以他们不能坚信中国

走和平发展道路能够成功。

在西方，对中国和平发展存疑最大的要数美国人。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李侃如说，中国称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以优先解决国内问题，别人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没有任何客观依据。但是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冲击到美国关键利益而为此感到不安。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也曾对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委员们说，中国自己在谈论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但是任何国家也不会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此类言词上。美国一些人不仅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持怀疑态度，而且在看法上产生了分歧。2006年10月13日，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约瑟夫·奈在墨西哥《宇宙报》上发表《东亚三角》一文谈到了美国人的这种分歧。他说：“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无法和平进行，它将寻求在东亚地区获得霸权，这将导致与美国和日本的冲突。另一些人则指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和谐共处’方针解决了边境问题，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注重发展软实力。”持后一种看法的人认为，中国有可能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反映出美国人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认识分歧很大。

美国一些人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持怀疑看法，是因为他们断定中国“将寻求在东亚地区获得霸权，这将导致与美国和日本的冲突”。从这点看，导致一些美国人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猜疑的深层思维，是西方的霸权理念和大国崛起理论对他们头脑影响至深。他们是依据近代西方大国崛起引发争霸战争的历史，以及从这些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大国崛起理论来猜疑中国的和平发展，所以他们怀疑中国崛起可能又是历史上大国崛起灾难的一次重演。他们不相信中国能够开创历史特例，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然而，历史往往是由无数的“特例”构成的，历史有时出现重复，但每次重复都会不一样。以中国而论，如果人们仔细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什么口头上的“言词”，更不是什么权宜的韬晦之计，而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实实在在的国家行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已在和平发展道路上迈出了三大步，先后奏响了和平发展的三部曲。

二 中国和平发展三部曲

（一）中国和平发展成为政治大国

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在 20 世纪 50 ~ 70 年代崛起成为世界政治大国。标志是 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新中国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政治大国，是值得政治学家们研究的问题。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崛起，往往伴随着武力扩张和冲突。例如 19 世纪初，法国能够崛起成为欧洲政治大国，便是以武力扩张为后盾的。当年拿破仑大军的铁蹄几乎踏遍欧洲，才为法国取得了主导欧洲大陆政治的地位。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在亚洲政治舞台上取得很大的发言权，也是与日本在亚洲大搞武力扩张分不开的。再如二战后，美国和苏联两极主导世界政治，均是以双方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划分势力范围、武力对峙为支撑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战争胜负，决定一国在世界上政治地位沉浮，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事实。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崛起却不是这样。50 ~ 70 年代，在这 20 多年里，中国除了抗击侵略和短期边境冲突之外（如朝鲜战争、中印边境反击战、珍宝岛边境反击战、中越边境反击战），没有向任何国家进行武力扩张，也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占领别国一寸土地。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中国在上同各国和平共处，在国际事务中秉持公道、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显然，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大国政治崛起的道路。

为了弄清中国为什么能够独辟蹊径，走一条和平发展道路实现政治崛起，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 20 世纪中叶的世界政治版图。20 世纪中叶世界政治主要由四大政治舞台构成：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三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舞台；四是大国之间的政治舞台。当年，中国首先

是在社会主义阵营舞台上崛起，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大国地位。中国能够取得这样的政治成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三大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1956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共产党内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还在国际上引发一股来势汹汹的反苏反共浪潮。第二个矛盾是同年10月，波兰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产生强烈反感，要求苏联从波兰撤军。苏联领导人认为这是波兰反苏势力的严重挑衅，决定派兵对波兰进行武力干涉，两国冲突一触即发。第三个矛盾也发生在这一年10月，是匈牙利出现反革命分子武装叛乱事件，危及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匈政府请求苏联出兵帮助平息叛乱，苏联领导人却撒手不管，反而要从匈牙利撤走苏军。这三个矛盾的出现，为中国共产党展示高超的政治智慧提供了机遇，中国先后派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带团访问苏联，劝说苏联领导人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并耐心调解苏联与波兰的矛盾，促成两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改善双方关系；此后又劝说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平息叛乱，保住了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中国解决上述矛盾的政治斡旋，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良好的反响。据当年主持相关报道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书中说：中国代表团斡旋成功登机离开苏联时，苏联领导人“纷纷感谢中国共产党先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他们，现在又在匈牙利问题上帮助他们”。^①

除了化解社会主义国家的上述矛盾，中国在50年代还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支援朝鲜人民保卫国家；60~70年代，中国还提供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支持越南抗击美国的侵略。这一系列政治举措使中国树立起一个坚持原则、主持公道、顾大局、高度负责的政治大国形象，在社会主义阵营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誉。

中国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仅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舞台上发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第15页。